

1949—1956中共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及政策^{*}

张旭东

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就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在华企业采取积极的态度与政策;提出“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重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等方面。这些思想和认识值得我们去总结。

关键词 1949—1956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 认识及政策

作者张旭东,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三峡大学特聘教授(北京 100091)。

如何认识和处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政治上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但是经济上并没有“一边倒”,而是积极思考如何利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思想和认识值得我们去总结。

一、对资本主义在华企业的态度及政策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后,外资在华企业有1700多家,投资总额为8.6亿美元,其中英资企业有299家,美国紧列其后,有212家。^①对这些外资企业,中国共产党没有简单地停留在“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上,而是明确区分了外国在华经济事业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控制权,在坚决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权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在华企业采取了慎重、稳妥的政策和办法。

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经济特权,包括他们在中国的驻兵权、内河航运权、海关管理权等等,新中国坚决取缔。1949年2月,毛泽东在同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谈话时指出:帝国主义同我们国家之间是有几笔大帐要算的。第一是他们在外国的一切特权必须彻底根绝。第二是他们欠我们的债务和一切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等必须全部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起来。1950年7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关于统一航运管理的指示。嗣后,外轮一般不许驶入中国内河,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并经政府批准,才能驶入长

江,但必须悬挂中国国旗,在指定码头停泊,遵守中国一切法令并封闭其武器和电讯、摄影、测绘等设备。至此,丧失了100多年的中国领水主权全部恢复。1950年12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定的《关于外人教会和外国人在华房地产的处理原则》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有土地所有权,不准许他们买卖或继承土地;对外国政府占有的租借地产、兵营地产明令收回等等。1950年1月,政务院通过《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1951年4月,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从此,取消了帝国主义对海关的管理权,中国海关从此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己掌握起来了。另外,新中国还颁布了《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实行外汇管制,建立独立自主的外汇经营管理制度,清除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中国外汇管理和金融财政的特权。

至于经济特权之外的资本主义在华资本新中国是采取利用和保护的政策。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指出,“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他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②。依据该思想,1949年6月25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人民政府在政策上对公用事业,无论是私营或外商经营,只要严格遵守政府法令,对人民生活和生产事业作有益的贡献,自当加以保护。”随后,这一政策被写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

^{*} 本文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2009年资助课题《中国共产党政策演变与外国在华资本衰亡》成果之一。

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1950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对此,中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措施,12月28日颁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1951年5月1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处理美国在华财产的指示》,对美国在华企业、财产进行了军事管制。但是管制并不等于征用和没收,美资企业被管制后,其资产和经营权仍属美国业主,中国政府仍允许它们中的大多数继续进行正当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并特别规定其他国家的大部分在华企业仍能独立自主经营。

但是,许多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因在华特权的丧失,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经济封锁,使得众多资本主义在华企业陷于无法维持的境地,许多企业只好申请歇业或转让给中国政府抵偿债务或自行放弃经营由中国政府作价收购。据统计,从建国初到1953年,外资企业由1192个减至563个,所属职工由12.6万人减至2.3万人,所有资产由12.1亿元减至4.5亿元。其中,英商企业由409个减至223个,职工由10.4万人减至1.5万人,资产由6.9亿元减至3.1亿元;美商企业由288个减至69个,职工由1.4万人减至1500人,资产由3.9亿元减至1600万元。^③

1953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确立后,剩余在华外资企业的经营受到限制并逐渐开始收缩,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大部分外资在华企业被收购、代管、接管、转让甚至自行歇业。除全部清理完美国产业外,英国在华金融分支机构全部结束业务,其在中国企业总资产的93.1%清理完毕,法国在华企业总资产的98.9%清理完毕,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的总资产的55.4%清理完毕;共处理地产面积的98.9%,房产的近90%。经过扫尾工作,所剩外国企业不到10家,清理外国在华企业和房地产的任务基本完成。^④

二、“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早在开国前夕中共开始确立“一边倒”政策时就提出来了。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相互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

本主义国家做生意”^⑤。

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中,中国共产党依然坚持“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妥善处理好政治上的“一边倒”与经济上利用资本主义的关系,体现了党在处理政治与经济问题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结合。在此思想指导下,新中国成立之初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增长很快。在我国1950年进出口贸易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占进口贸易额的66.2%,占出口贸易额的66.8%。^⑥

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禁运,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紧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依然没有放弃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的设想,而是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打破突破口,发展同它们的经济关系。

1952年4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公开宣布“我们对各国的经济关系,采取积极的恢复与发展的方针。我们对于各国政府和人民,不管其信仰、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同,只要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均愿与之恢复与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并表示“我们并认为中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首先是英国、法国及西欧、北欧等国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将使欧洲国家有可能从中国获得各种食品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同时有可能向中国推销和平工业的产品,这将有利于我们彼此各国恢复与发展和平工业的生产并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中国人民愿意在这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⑦。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更加强调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关系。1953年10月8日,中央在批准对外贸易部工作指示中指出,“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对我国经济建设是有一定需要的,对加强世界和平民主是有很大的、积极的作用的,因此,必须依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积极去开展”^⑧。

与此同时,新中国还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打开突破口。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冲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同西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这些国家较快地承认了新中国,有些国家在不长时间内还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1952年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与会的40多个国家的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探讨开展贸易问

题,并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 11 个国家的工商团体和企业签订了贸易协议。1953 年 7 月,中国在东柏林设立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处,开辟了中国同西欧国家直接进行民间贸易的渠道和窗口。

针对英国在华有着特殊的利益,1954 年 8 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⑨。同样,为了发展同法国的经济关系,1954 年 8 月周恩来指出,“法国是有生产能力的。它要恢复经济,就要找出路,找广大市场。东西方贸易就是出路”^⑩。正因如此,1955 年后,中国从西欧国家进口了许多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物资。1956 年秋,在广州举办了第一次出口商品交易会,以后,“广交会”就成为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到一九五七年底,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 6 倍多。^⑪

三、重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思想

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急需国外资金和技术的援助。在“一边倒”的政治环境下,年轻的新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取得资金和技术的援助这在情理之中,但是,“因为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需要很大的资金去发展他们的工业”^⑫。所以,即使就在“一边倒”的政治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依然坚持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形成的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思想。

1950 年 1 月,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同苏联在新疆合办金属和石油公司的建议时指出“这种事业可能不只在新疆,不只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工厂和企业。甚至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团体和资本家也可能要求来办这种工厂和企业。……此间同志认为是可以作这种要求的。”^⑬1950 年当中国与苏联签定了三个合资企业协定后,4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用外资和技术来发展我国经济建设是一件大事,不独是和苏联,就是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以至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不独开办这三个合股公司,就是开办其他适当的合股公司以至实行某些事业的租让,在事实上有时也还是需要的。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纠正“技术一边倒”

的口号,主张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1953 年 4 月,中央针对当时“技术一边倒”口号流行颇广的现象,专门发出指示,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指示指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她好像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必要性似的”^⑭。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就已经意识到技术是非阶级性的,它不姓“资”,也不姓“社”,可以为各种制度服务,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1955 年初,中国向瑞士订购了五套列车电机设备。瑞士成为西方世界中第一个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的国家。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又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⑮

在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思想的同时,对于学习的一些原则,中共领导人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思想。

第一,要从思想上破除社会主义一定优越资本主义的迷信观念。建国初,在相当多的人看来,社会主义一定优越于资本主义。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的那样,对于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口号”。“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要想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首先就得破除这个“迷信”。毛泽东强调“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⑯1956 年 5 月 3 日,周恩来在《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一文中也指出“我们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这是一回事,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阵营一切都好,非社会主义阵营一切都不好。从

社会制度来说,两种制度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世界的前途,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是说,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国家就没有可学的地方”。所以要“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①只有我们从思想上端正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才能为我们向资本主义学习打下思想基础。

第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②首先,对于资本主义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批判,不能学,毛泽东指出,我们在学习外国技术和管理经验时要注意,“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③。其次,要有取舍,反对照抄照搬。“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④即使是外国的长处,不能盲目地学,学习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要同创造结合起来。“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⑤在反对社会主义一定优越于资本主义错误倾向的同时,也要批评在资本主义面前自惭形秽的倾向。为此,毛泽东尖锐批评了那种在外国人面前的“贾桂精神”,他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⑥。强调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时候,要树立民族自信心。

第三,“派出去”、“请进来”。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有多种渠道。一是“派出去”,即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取经。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⑦二是“请进来”,即把外

国人请进来。1956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人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在中国人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各国都有份。^⑧

注释:

① 徐京利《另起炉灶——崛起巨人的外交方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②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1435、1435页。

③ 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④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270页。

⑥ 顾龙生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

⑦《新华月报》,1952年第4期,第171页。

⑧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综合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第863、862页。

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⑩⑰《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9、158-159页。

⑪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⑫《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⑬《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⑮⑯⑰⑱⑲⑳《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3、41、41、43、42、43页。

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㉒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0页。

㉓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责任编辑:朱可辛]